

心中常念老社长

丁法章

今年是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新民晚报社原社长赵超构先生逝世30周年。作为他的同事、曾和他面对面办公的一名后生,我打心底里深深崇敬他。30年来,他的音容笑貌,特别是他的为民情怀和办报理念,一直在激励着晚报同仁,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先人后己

1988年年初,我到《新民晚报》履新的前夕,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心瀚陪同我去看望赵超老(晚报同仁对他的尊称)时,这位比我大30多岁的著名报人和儒雅长者,虚怀若谷,对我这个后学表示欢迎,并谆谆嘱咐我说:“你在青年报做过总编,对青年工作比较熟悉,希望你来后先把报社青年同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在临别的时候,龚部长询问他说:“最近我们拟组团访问香港,您老可否有兴趣参加?”他毫不迟疑地说:“还是让其他同志去吧!”

赵超老长期居住在虹口区的一间老式公寓内,条件比较简陋,不仅楼梯十分陡峭,上下不便,而且在楼板上走动还会发出阵阵声响,为此组织上曾数次提出为他改善住房,他总是婉言谢绝:“还是先考虑其他同志吧!”

以民为本

人民至上,以民为本,这在赵超老的心中是深深扎了根的。他将《新民晚报》自诩为报春的燕子,要广结善缘,飞入寻常百姓家,衔泥筑巢,呢喃细语,向人们报告春天的讯息。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时,他曾在《复刊的话》中写道:“为百姓分忧,与百姓同乐。”一位老同事觉得这句话中出现两个“百姓”,有重复之嫌,便改成“为国家分忧,与百姓同乐”。文章见报后,赵超老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样一改,含义大不相同。后来出书时,又改了回去。

赵超老之所以不想搬离原住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住处他交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他说:“我只要到家庭附近走一走,上海平民百姓的急难愁盼,就能了解个八九不离十了。”他对人民性如此看重,那么对党性又如何呢?他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让驾驶员去买一份当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旨在通过阅读掌握上级意图,以便报纸宣传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这也是他在制定“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16字编辑方针时,之所以把“宣传政策”放在第一位的根本原因。

术有专攻

《新民晚报》是一份历史悠久和影响深广的报纸。在长期的办报生涯中,赵超老所开创的办报理念和生动实践,被誉为中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为全国广大晚报工作者提供了根本遵循。他从时间和空间的视角,对晚报的定位、特性和功能,作了精准而有说服力的阐释,集中体现了他的为民情怀。他强调,晚报要在“晚”字上做文章,充分发挥与日报打“时间差”的优势,凡日报截稿后所发生的国内外要闻,都应在晚报版面上得到反映,以满足广大读者求知的欲望。他还指出,要千方百计增加信息量,扩大覆盖面,让8岁到80岁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能从晚报上读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时,要注意改进传播艺术,力求在“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上下功夫,秉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提高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使晚报真正成为广大读者朋友喜闻乐见的“灯下客”。



七夕会

朋友是单身妈妈,一直和尚未成家的女儿同住。母女每天各自上班,业余时间也各有自己的朋友圈,日子倒也过得和顺。可是近来,工作时间相对自由的居家办公让母女俩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以至于最后剑拔弩张,双方都到了崩溃的边缘。

朋友跟我诉苦: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饭菜热了三遍也不来吃,喊一遍两遍没反应,第三遍免不成了嗓门就大了,这可捅了马蜂窝了,女儿不鸣则已,一张嘴就能回上十句。

做女儿的当然也有一肚子怨气:烦死了烦死了!自己想睡就去睡嘛,管得也太多了!黏嗒嗒的银耳羹,烂糊糊的各种粥,谁要吃啊?我肚子饿了自己会去点外卖!女人更年期都是这样更的吗?

她女儿从小在国外长大,更喜欢吃的是西式饭菜,对朋友煲的各种汤、熬的各种粥并不感兴趣。于是母女俩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整天大眼瞪小眼儿的,有时闹别扭甚至几天说不上一句话。

我劝朋友:“二十几岁的孩子还肯跟你住在一起已经很不错啦。没见人家老外十八岁以后就都搬出去了吗?”

和女儿做室友

李静明

不知是我的劝解起了效果还是她们各自想通了,过了一段时间,朋友见到我眉开眼笑:一切关系都理顺了,和女儿和好如初。问其原委,答曰,只需三个字:各管各。大家各自买自己的菜,做自己的饭,在自己喜欢的时间内吃,吃完了洗自己的碗。朋友现在该吃吃,该睡睡,不再操心女儿的日常生活。她说:“现在过了半夜我也不喊她睡觉了——她要是住在外面,就是整夜不睡我也不知道呀!如今我过我的生活,她过她的生活,大家都觉得轻松多了。当然了,我们买菜的时候也会问一下对方是否需要带点什么,碰到她爱吃的我会多做一口给她,她烤了牛排也会邀我一起尝尝……”我笑说:“这不成了室友了吗?”朋友说:“还真像室友呢,总体上各自独立,需要的时候互相帮助。家庭开销可能比原来大了点,但太值得了——这个周六下午女儿约了我去附近公园骑车呢。”

退一步海阔天空。朋友明智地选择了放手,既是放过了女儿,也是放过了自己。我不难想象,周末朋友幸福地去赴女儿的约会,一路上铃声串串,两个女人像推心置腹的室友一样聊天谈心。

烤麸就像过房儿子,姓的是寄父的姓,流的却是亲爹的血。

你看,超市、菜场里的烤麸,总与豆腐、百页、腐竹、素鸡同框,不就跟那些豆制品称兄道弟了嘛。而实际情况是,烤麸归属小麦谱系,与大豆没啥关系,它应该与面包、饼干、方便面为伍才名正言顺。

要说把烤麸看作豆制品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没准错,正好比人们只认定萧伯纳是正确的表述而伯纳萧不是。因为按照这个逻辑,马克·吐温该叫吐温·马克才是。但,谁的胆子有那么肥?

小小的错位,竟然让绝大多数人无意或无力去改变,真太邪门了!

事实上,烤麸与面筋才是真正的孪生兄弟。在拙文《油面筋塞肉》中,我介绍过面筋的制作情况,现在我愿意再概括地提一句:面筋是用带皮的麦子磨成麦麸面粉做成面团,接着用凉水搓揉筛洗,去除淀粉和其他杂质后分离出来的蛋白质。

烤麸呢,就是——以生面筋为原料,经保温、发酵、高温蒸制而成,其性状为:黄褐色;像海绵那般多气孔;松软而富弹性……

面筋仿佛读了本科,烤麸仿佛读了硕士。那么,是不是“硕士”比“学士”更高明呢?不一

定。从吸纳汤汁和口感舒服而言,烤麸胜过面筋;从蛋白质和碳水含量而言,烤麸出于面筋而低于面筋。

既然如此,“那还用说!当然首选对身体更有营养而不是口感。”聪明人难免会作如此判断。可是,事情往往并非如我所愿:白煮蛋营养最好,为什么人们普遍喜爱茶叶蛋、荷包蛋、炒蛋?老鸭汤营养最佳,为什么人们普遍喜爱烤鸭、酱鸭、盐水鸭?这些“异化”现象,用“马斯洛需求”原理来观照也解释得通。

与豆制品柜里的其他品种相比,烤麸总是显得猥头猥脑,顾影自怜,毫无精神。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与其外在形象合拍,另一方面与其缺乏顾客足够的关注度密切相关。确实,各色豆腐以及豆腐干、百页、素鸡等都有亮丽的装束,烤麸则非常寒伧,甚至很多时候是在“裸奔”。

长得饱满的女士最忌讳别人投来“素鸡”两字。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人家还没给出“烤麸”一词呢。就外形而言,“烤麸”予人的打击基本属于降维级别——虚空、松弛、涣散、皱褶、黯

四喜烤麸

西坡



暖、萎靡……“素鸡”到“烤麸”,简直就是从杨贵妃径奔慈禧太后,一点也不给反驳的机会。

然而,正是由于这种“无精打采”,烤麸才能脱颖而出,成为餐桌上的明星。

无论是正宗豆制品的豆腐、百页、素鸡,还是伪豆制品的油面筋、水面筋、鱼豆腐,我们品尝到的滋味基本上是包裹在外的汤汁部分。豆制品们都没有烤麸那样用力吸收汤汁的能力,只有烤麸彻底敞开心胸接纳汤汁,并且获得了沦肌浹髓的效果。我相信吃过“四喜烤麸”的朋友都有体会。

“四喜烤麸”一般由烤麸以及黑木耳、花生米、笋片、金针菜等食材组成。

中式冷菜仿佛一部歌剧中的序曲,非常好听。通常我们认为序曲中最好听的是其中的慢板部分,“四喜烤麸”就是。虽然“四喜烤麸”不一定是最出色的,但一定老少皆宜对胃口。

湿漉漉的“四喜烤麸”让人口感滋润。不夸张地说,“四喜烤麸”在票证时代很难操作——不光烤麸要凭票购买,黑木耳、花生米、金针菜享受了同等待遇,家庭

主妇为此捉襟见肘。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有一种干烧烤麸。那是我母亲绕开“雷区”的“专属经济区”:把烤麸撕碎,食盐、酱油、砂糖待候;入油锅炒啊炒啊(母亲喜欢用一个“拉”字),直到烤麸不复是方块状而呈现为颗粒状;已成小分子的烤麸在酱油、食糖的作用下彼此黏结,形成肉眼不易察觉的一坨一坨,外表接近糯米八宝饭;开吃时用筷子把它挑起(我们习惯用“挑”字),一筷一坨;时大时小,完全取决于力度和幅度的大小;放在嘴里一抿,结构渐被濡化;喉咙鼓捣一下,滑入食道,满脑子萦回着甜津津的味觉记忆。

在无法“四喜烤麸”的时代,干烧烤麸算得上是一种精致、高档、富于艺术感的操作,好吃不费。当然,“不费”的是钞票而不是人工,可那时的人工恰恰最不值钱。

中国古代没有“烤麸”一说,有的只是“麸”。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提到乳水龙麸、五味熬麸、糟酱烧麸、麸笋素羹饭、笋丝麸儿……那么,烤麸为什么要用“烤”字?会不会是“耀”(小火煨烧。宁波有“耀菜”一说)字的异写?特留“回家作业”一道,让大家搞搞脑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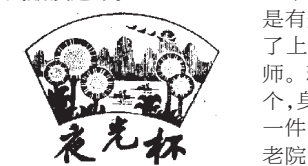
须知,你想知道的,正是我也想知道的。

养老院来了社工师

石路

“96岁的戚老太,子女把她从偏远的私人养老院转到这里。入院后,老人情绪反复出现波动,心理表现极度焦躁,几次吵着要回去,要回去!原来,她竟是想住差点儿的养老院,为儿子省点钱。”

“陈老伯来养老院后,一直闷闷不乐,问他为啥?了解后,是他在养老金和房产的支配上与子女沟通不畅形成心结。相互猜疑,使老人原本脆弱的心更感无助,以至于滑落到崩溃边缘。”



“这天,安老爹早起,他女儿要来看他。一番整理后,就等女儿来。见面彼此格外亲切,寒暄、交流,起初还算正常,可过会儿,老爹就冷不丁冒出‘你是谁?’‘你爸爸好吗?’令女儿哭笑不得,也使我很难尴尬。”

一个上午,昔日机关的同事老袁正好到镇上办事,顺道来我办公室。我与老袁相识近20年,共事7年多。他退休后,现在小镇一家公办养老机构做老年社工。18年前,也许是有先见之明,他就考取了上海第一批社会工作者。现年72岁的他,中等个,身上永远比别人少穿一件,面色红润。经营养老院的空早就属意他,就待他空下来,60岁开外的创始人志刚兄曾是市区的媒体人,来小镇做养老已十多年,眼光“老”到。

我对老袁说:“你做这个在行!”在职时,他一直



金色的呼伦贝尔 沈洪摄

做人的工作,是“老政工”。他说:“做养老,听起来时髦,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管吃喝就行,老人困惑事可多了!”话匣子一打开,他就与我分享了许多在养老院碰到的“这那事”,就像开头的那些。

这几年,他配合院长及养老院管理层为许多老人排忧解难。每次查房,除了向老人嘘寒问暖,更多是观察老人表情,与他们多交流,从中了解老人心中的苦恼事、揪心

事。去年,上海市养老服务行业协会举办全市首届养老服务案例评选,老袁所在养老院选送的《养老院老人的一个心结在社工参与下成功化解》获评10个“上海市养老服务优秀案例”。

但是,老袁说,现在,养老院拥有专业社工师的仍然不多,自己属于“敢吃螃蟹的人”。在实践中,他也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工作者在现代养老服务体系里大有可为,依据需求可扮演老人心理危机干预者、认知障碍包容者、无助资源链接者等多重角色。这天,我们就养老话题谈了很多。屋外一股寒意,然而听了老袁讲述,心头却升腾些许暖意。这次见面后,我和老袁不时通过微信、电话、文字等方式进行交流。养老是大事。谁人能不老?谁又能想象自己到老时是何种状态?社会需要更多的养老建设,其中,当然也包括优秀的专业社工师人才!

读到“夜光杯”上戴平女士的文章《三位大师,一帧合影》,文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朱(光潜)先生在逝世的前三天,神态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嘿嘿地说,要赶紧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寥寥数笔将朱光潜先生

《新科学》1986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朱光潜先生于当年3月6日不幸去世,生前没能看到这部巨著问世。从时间上判断,戴女士文中说“在逝世的前三天”朱先生还拖着病体,爬到书房“要赶紧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应该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中译本《新科学》全书669页,49万1千字,共有近160处“中译注”,注释有详有略,从数百字到十数字不等,内容涉略文史哲,极为渊博。朱先生在写于1983年的“译后记”里说,他“下定决心,动手来译”

《新科学》时已年近八十。篇幅如此巨大的译注工作,对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而言,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朱先生列举了翻译此书的诸多困难,首先是语言和知识面:“我既不懂意大利文,又不懂拉丁文,古代史过去在英国虽也学过(朱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但是

巨大的译注工作,对于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而言,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朱先生列举了翻译此书的诸多困难,首先是语言和知识面:“我既不懂意大利文,又不懂拉丁文,古代史过去在英国虽也学过(朱先生早年曾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但是

百出,但是我在克服困难中认识也有所提高,特别是稍懂得一点历史发展的道理以及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创造性作用。”最后希望“新起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之中终会有人肯费一番功夫,拿出一部《新科学》的较好的新译本来”,他自己的这部译本可以有助于将来的改译者,并且说“历史将会证明这不仅是老我老汉垂死前的一种奢望”。读至此,不由得让人既敬佩又伤感!

《新科学》是意大利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维柯的代表作,是学界公认的历史哲学的奠基之作,对后世西方众多哲学家产生了重大影响。朱先生的中译本出版后,《新科学》在国内也成了热门读物,仅仅首版一年不到的时间(1987年3月)就有了第二次印刷,印数是14300册。后来还不断地重印,具体数字因手头没有最新版无法统计。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坊间似乎还没有新译本问世,我们后人实在愧对朱先生了。

朱先生还谦逊地说:“错误必然

朱光潜和《新科学》

吴其尧

养

育